

Eksistenz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Vol. 3, No. 1 (Sept. 2024)

Hermeneutik und Technik

弗朗柯·沃尔皮 (Franco Volpi)

王宏健 / 译

为什么是实践哲学？ ——技术时代的意义定向问题¹

摘要：我们的时代可谓是科学与技术不断进展然而哲学却不断失势的时代，其根本特征是价值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科学与技术一方面解决了无数个个别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无法解决人类行动和生活整体的意义定向问题，而后者是我们无法放弃的问题，是哲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基于此，哲学不应该满足于成为某种代偿知识，也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某种精神科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必须重拾其与实践问题的联系（哲学的这种实践要求始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将自己理解为某种“实践”哲学。

Zusammenfassung: Unsere Zeit kann als eine Epoche beschrieben werden, in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unaufhörlich voranschreiten, während die Philosophie zunehmend an Bedeutung verliert. Ihr grundlegendes Merkmal ist der Wertpluralismus und Nihilismus.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lösen einerseits unzählige spezifische Probleme, doch andererseits können sie das Problem der Sinnorientierung menschlichen Handelns und Lebens nicht bewältigen – ein Problem, auf dessen Lösung wir nicht verzichten können und das ein Grundproblem der Philosophie darstellt. Daher sollte die Philosophie sich nicht damit zufriedengeben, bloß eine Art kompensatorisches Wissen zu sein, noch sollte sie sich auf den Bereich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beschränken. Vielmehr muss sie ihre Verbindung zu praktischen Problemen wiederherstellen (dieser praktische Anspruch der Philosophie begann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 und sich selbst als eine Art „praktische“ Philosophie verstehen.

Abstract: Our time can be described as an era in whi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constantly advancing, while philosophy is increasingly losing importance.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is value pluralism and nihilism. On the one h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lve countless specific problems, but on the other

1 本文译自Volpi, F., “Warum praktische Philosophie? Zum Problem der Sinnorientierung im Zeitalter der Technik”, in: G. Figal, J. Grondin, D. J. Schmidt (Hg.), *Hermeneutische Wege. Hans-Georg Gadamer zum Hundertsten*, Tübingen: Mohr, 2000, 325-333.

hand, they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meaning orientation of human action and life - a problem that we cannot avoid solving and which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hilosophy. Therefore, philosophy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being merely a kind of compensatory knowledge, nor should it limit itself to the realm of the Human Sciences. Rather, it must re-establish its connec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practical claim of philosophy began with Plato and Aristotle) and understood itself as a kind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技术; 虚无主义; 实践哲学

一、失势的哲学

贯穿着所有科学学科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快速发展进程，而这对于哲学研究而言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倘若人们想要“保持水准”，那么，现如今——即便是在哲学中——已经没有其它可能道路。时至今日，即便在哲学领域，也无法设想在现代信息网络和记录系统之外的单独空间了，没有相应的专业化、制度化和财务资助，任何研究都无法实现。

对于活生生的哲学思考而言，这一发展较之任何其它知识领域都更为灾难性，因为随着这一发展趋势，它导致了片面朝向具体可证实的结果，亦即实质上放弃了传统哲学的宏观的提问方式，并且它带来了对哲学史的任何可能角落的历史考察。诚然，这一高度专业化的发展也威胁着扼杀对于哲学思考的实行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批判性提问和追问的能力，这种提问和追问是面向整体的，针对专业化的个别学科和话语种类，其运作方式必然也是一般性和跨越性的。

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之中，依然存在着某些领域和向度，以及由对我们生活世界的技术殖民所引发的问题，对于这些而言，在一般性的迷失方向之中，自觉的、批判性的哲学之思想和提问始终是不可放弃的。

这样一种领域无疑是实践，人类的行动和放任 (Tun und Lassen) 及其伦理、政治意蕴，首要的则是对某种意义筹划和意义定向的需求。随着神学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文化的传统意义框架的流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看起来越发困难，而这一问题也越发急迫。

当今，哲学的这一能力并非不言自明的，因为人们无法对以下这个

到处回响着的问题充耳不闻：在当前，哲学——作为对实践理性之何所是和能力的反思——对于生活之定向，对于我们行动的规范和可能的有约束力的意义建构模型，究竟是否还有话语权？当今时代，哲学已经演变为诸多精神科学学科中的一种，甚至可以说，哲学已经因为其它的知识形式亦即科学与技术而失势了，那么它是否还能够要求为当前的人类之失向给出答案？

笔者的论题是：倘若哲学尚且对此有所要求，那么，它就不能被还原为某种单纯描述性的精神科学。哲学必须保持其与实践问题的联系，并且——诚然是以间接的方式——追求实践意义，亦即将自己重新理解为某种“实践”哲学。

二、科学与技术作为不可放弃的知识

为了检验哲学的这一要求，适当的做法乃是更切近地考察以下这一现象，亦即似乎在当今明显地给予实践问题以决定性答案且使得每一种实践哲学变得多余的现象。当今，我们拥有某种操作性知识（operatives Wissen），较之其它知识，它能够让我们的行动更好、更快速、更有效地成功。这是科学和技术知识，通过其快速的进步，它已经从根本上被证明为能够达到每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功。其成就是明显的：当今的人们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知识，以解决一切类型的问题，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向度上成功地行动，以安排和规划其手段与目的、其规则与或然性。简而言之，这一知识深深地渗入了人类行动的一切领域，并且征服和殖民化了我们生活的一切空间。在当今，它似乎是一种无法放弃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生物学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退出”或彻底拒绝的尝试似乎是浪漫主义的迷梦。时至今日，即便科学与技术具有某些反常的结果，但从总体上拒斥它是行不通的。我们无法自由地在进步和退步之间做选择，因为进步持续地给我们带来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继续进步才能被解决。在这一发展背后隐藏着的不僅僅是某种现代的反常，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援引海德格尔（尽管不必成为海德格尔主义者）：“然而在此，真正阴森的并非，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技术化的世界；远为阴森的乃是，人类对于世

界的这种变化毫无准备。”²

因此,重要的是探究是否还有尚未耗尽的现存的意义资源,依据它我们可以在全球化意义经验的框架内、在某种有约束力的符号和文化视域内抵御科学和技术。针对科学与技术的挑战,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究竟当采取何种态度?

三、科学与技术作为对哲学的挑战

一开始,当代哲学思想就把科学与技术的特征看作某种进步的人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功能的某种原则性区分。一般而言,科学旨在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这无论如何都是积极的;而技术则是对这一知识的实践应用,这涉及良好应用的问题。技术本身不包含任何诡计或反常;其价值仅仅取决于其应用。因此,在哲学的时代意识中,科学与技术首先、主要站在反抗蒙昧主义和人类异化的一方,为了启蒙和解放而抗争。他们有助于将普罗米修斯从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人类创造一种美好的、至少是更好的生活。在这种进步的、乐观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框架下,着眼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哲学的批判意识并未尤其警觉。为了制度上的承认和建设,哲学很乐意呈现为精神科学,且通过其奠基于精神科学的、人本主义的总体框架为科学和技术提供某种文化上的巩固。这里说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结合”。

然而,特别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科学和技术在我们世界中的地位及其文化上的自身呈现逐渐地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首先是其含义的改变: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无法呈现为我们世界的简单组成部分之一。它们越来越成为知识和行动的某种无所不包的支配性形式,成为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起支配作用的权力综合体,其命令被认为具有优先性和独特性。科学和技术成为了某种全球性的重大要素。

按照“上帝之死”、“迄今价值的罢黜”、“意义消逝”、“中心的丧失”以及虚无主义的进一步现象,在科学与技术中自行推进的意志摆脱了一切超验束缚,并且依据其自身的动力机制而发展起来。它极大地提升了人类针对自然的力量和干预可能性,且同时在其中引发了对无限增长的追求。

2 Martin Heidegger, *Gelassenheit*, Pfullingen 1959, 20.

诚然，这一发展动力机制和结构改变带来了某种递增的能力，亦即代偿人类的不完美的自然禀赋——诚如赫尔德已经注意到，人类乃是缺陷物”。但它也联系着操纵人类本质的递增能力。“人类”这个普全者、这个普遍概念，这一曾几何时被哲学家们所“思辨”的抽象本质，在当今看起来被充作实验室里基因组的具体[研究]对象，人们可以任意“操作”它。在这一处境中，除了技术上可制作之物以外，技术甚至无法识别任何其它界限；其次，因为技术令人难以置信地扩展了我们的个体和集体自由，因而技术的权利（亦即始终重新尝试可能之物）会得到保护。这样一来，通过祛魅化和虚无主义的意义空洞，技术面临着使得由它所揭示的自由空间变得荒芜的威胁。

四、技术进步与传统人本主义之争

在这一点上，科学和技术开始陷入与传统的、精神科学的人本主义的争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在这种人本主义的保护下进行的），特别是陷入了与从道德上阐释人类之观念的先验性的争论。自此，一切都改变了。此前联结科学和技术与进步的活力联盟，宣告终结。越发技术化、乃至在基础研究中就已经具有操纵性的科学的诡计与人本主义文化的“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正相反对。人们曾经采纳的调解性措辞，所谓的“两种文化的结合”抑或人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幸运和谐”，被证明是空洞的套话。知识的纯粹性和科学与技术的中立性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人们在“纯粹”研究的层面上、而不必在应用的层面上就可以了解可能的危险，并且可以严肃地提出以下问题：是否应当——即便是违背了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宝贵成就而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自由的原则——拒绝某些实验。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持续被阐释为对提高和推动人性有所助益，然而，在当今，许多地方都开始怀疑科学技术发展和传统的、精神科学的人本主义价值之间的据说必要的联盟。即便科学和技术无疑能够给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掌控生活的手段，然而，它们根本上没有能力着眼于终极目的，为人类行动和生活整体提供定向，将其安置到某种符号化的意义视角之中。与我们对符号资

源的需求相反, 科学与技术一再被证明为从根本上是“非符号的”。的确, 借助于由它们所施行的世界的祛魅化, 它们掏空了此种视角一般的可通达性, 也因此掏空了以下这些基本问题的在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五、多神论: 决断的不可通约性

这一境况由于科学的价值无涉断言而加剧了。某种纯粹的、价值无涉的知识意义上的科学理想的提出, 导致了传统理性失去了其实质性内涵, 被还原到某种单纯工具性的理性之上。由于不可能从中赢获某种理性的、全球化的行动定向, 最后一种如此建构的科学理想失去了它对生活的重要性。它也失去了其生活意蕴。

在此所刻画的西方理性的危机早已成为著名诊断的对象: 韦伯和斯宾格勒,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可以作为知名人物被提及。那时候他们批判性地、富有远见地以各个不同的视角所认识到的发展动力的后果, 在今日已经昭然若揭。

在经济人 (*homo oeconomicus*) 的压迫性命令之下, 由工匠人 (*homo faber*) 所带来的世界改变脱离了道德 - 实践理性乃至——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治 - 实践理性的审判。传统的意义框架和符号资源快速瓦解, 真、善、美的宏大理念似乎到处都变得破碎和无力。在纯粹理性的界限中, 人们认为终极目的和价值是未经论证且无法论证的。人们发现, 曾经的价值专制变成了价值的均力 (*Isosthenie*) 和无政府状态, 而这导致了诸种规定的同等衰弱、诸种禁令的同等愚昧。现代性似乎注入了这样一种信念, 亦即价值的彻底不可通约性与无决断的多神论乃是不可回避的, 而这又导致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因为按照价值来阐释世界导致了价值的普遍中性化。甚至对“价值”概念的使用也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来说, 这里相关的不再是某种价值多神论, 毋宁说是某种决断多神论。时至今日, 形式之物耗尽了实质之物, 习俗之物取代了自然之物。一度由古老欧洲的文化语义学所提供的真理——神话、宗教、宏大意义叙述及其相应的典范、意识形态——在虚无主义的警钟之下放弃了它们的精神。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现

实，而由于技术的总体运动的几近地质上的力量，德性和道德尚且拥有的不过是稀有化石般的美好和吸引力。因此，虚无主义不再是病理学状况：它已经成了一般状况。

六、我们身处的悖论

然而，着眼于意义定向的真空状态，人们感受到了某种混乱的不安，这种不安也出现于大量危机文献的消极措辞中。由于实质理性的悬缺与对生活世界空间和意义资源的技术殖民，当今人们以不同方式通过远离现代的理性观（这一理性观已渐成习惯）而对此加以回应。所谓的后现代通过远离这一观念，而尝试重新激活整体性的意义机所，如神话、宗教、艺术和政治，并借此重新赋予生活世界以完整性。然而这种重新激活无法抵挡非理性、无政府主义和失序的幽灵涌现。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在当下的后现代中人们不再采取涵盖性的批判方式（如韦伯将现代性阐释为祛魅化和理性化进程，具有黑格尔-马克思特色的历史-辩证的历史哲学，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诊断），而是首要采取一种排斥性的批判。这意味着：不再以尝试接受现代性的问题和立场且纠正其病理的方式进行阐释，而是直面现代性，从根本上拒斥现代性及其理性观，亦即不再将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而是看作一项失败的规划。因此人们开始寻求西方理性的替代物，回归感性、神话和艺术。

因而，在当今世界中，着眼于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定向，我们处于某种矛盾处境之中。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理性化解决了大量个别问题；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似乎始终是某种次要之物，它无法给定符号经验和终极目的，以便容纳人类行动与生活整体。由于古老欧洲的参照系的基础危机和衰退（无论是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参照系，其传统内涵都被科学-技术的理性化所侵蚀），这一矛盾处境愈发加剧。在具有人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精神科学的祭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礼拜仪式了，仍呈献的仅仅是代替性圣物。

在人类可制作之物和理性决断（即决断做什么有意义）的能力之间，敞开了某种越来越深的裂缝。科学与技术不断增长的力量扩展了我们行动的作用世界，无论是在宏观层面（对原子能的利用）还是在微观层面（此处最令人不安的例子就是对基因技术的操纵可能性）。我们的处境在原则上又要求某种更有约束力的定向——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不再拥有迄今的意义资源，因此我们的道德定向能力越发虚弱和不稳定。科学与技术启动了对全球的动员，这威胁着每一种迄今的均衡和每一种传统秩序。鉴于这种去稳定化而裂开了某种真空，在其中，当今人类在其本就不稳定的决断能力中（决断做什么，或者更合适的表述，决断让什么）陷入了某种无定向之中，凭借着其情绪的令人惊讶的天然性或者其理性的无限性，人类孤独地处身其中。

与之相对的是今日流行的采取代偿的趋势。人们相信，可以在与科学和技术相反对的知识中，亦即在关于艺术、文学和精神科学的人本主义的知识中发现这种代偿。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精神科学的代偿功能这一课题。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宗教、秘传式的替代道路可供选择。哲学思考看起来面临着以下选项：或者是一种偏向于科学和技术的反思，亦即推进知识信仰与技术信仰，或者是采取某种田园牧歌的态度；或者是投身于一种寄生的服务岗位，亦即成为科学的婢女，或者是成为一种苍白的、无能的代偿知识，人们对它的满足要超过某种替代性安慰物。

七、关于一种理性的行动定向的思维模式

着眼于这一普遍的失向，并不缺乏关于一种理性的行动定向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些解决方案并不仅仅来自于哲学，毋宁说也来自其它学科，例如社会学（卢曼系统论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盖伦的人类学制度学说和道德理论）、民族学（康拉德·洛伦兹向道德和文化批判地形的渗入）。

而在哲学方面，在当今的众多选项中，有一些方案脱颖而出，应当得到仔细的检验，因为即便它们没有立刻给出具体行动定向的坐标系和关联点，但它们至少唤醒了和对问题和疑难的某种批判意识，由此而指明了前景。在此我想要提及以下这些方案：

第一，约纳斯对技术文明的伦理学的筹划，建基于“希望原则”。

第二，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交谈伦理学作为为伦理和政治理性奠基的范式。

第三，对实践知识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重建，由哲学诠释学，亦即首先由伽达默尔，然后由鲁迪格·布伯纳（Rüdiger Bubner）所发动。在此值得提及的是其它类似的方案，它们以独立的方式尝试某种伦理学或政治学奠基，例如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由现象学和亚里士多德同时激发的“对政治意见的重建”，蒂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核和平的伦理学”，汉斯·克拉默（Hans Krämer）的“个体伦理学辩护”或麦金泰尔的“交往主义”。

第四，无数的“应用伦理学”方案，亦即尝试以道德哲学的视角探讨一切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由全新的侵犯可能性、行动类型和处境所产生的问题。应用伦理学与原则性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聚焦于具体的个别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在此它首要在医学（医学伦理学与生物伦理学）、经济和生态领域被提出，它希望以最小化的策略继续前行。

八、开放式问题：做什么，抑或让什么？

在多种选项之中，看起来人们的痛苦仅仅在于选择。然而，我们可以怀疑的是，是否真的有一条引领我们走出危机的道路。因为当今时代没有人可以要求获知行动定向问题、乃至终极的意义问题的答案。而当我们无所定向的行动的后果通过科学和技术而被提升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时，这种禁止定向就更具压迫性。也许哲学——作为还原到某种精神科学的哲学——可以满足某种重要的代偿功能，并借此减缓当前的定向匮乏。但借此，这种定向匮乏还远没有被消除。相反：倘若哲学在精神科学的航道中满足于单纯的代偿功能，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强化以下这种印象，亦即哲学是一种牧歌式的、最终是无能的知识。从这样一种被精神科学所过滤的哲学出发，很难设想它能够真正符合我们时代的挑战。在传统人性的符号和文化意义资源的渗透之下，重新产生的是以下这个问题：做什么？

通过对马克思的那句著名格言的挑战性颠倒，人们一度说道，仅仅

改变世界是不够的，因为即便没有我们的意愿和协助，世界也会自行改变。毋宁说，重要的是恰当地阐释和调控这种改变，以便让世界不是作为没有我们的世界而自行实现，就像没有君王的“人类王国”。如果这样一种阐释和调控乃是哲学的根本使命，那么，我们就理应即刻重拾哲学的这一“实践”要求，这种要求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隶属于哲学，随着近代与现代哲学朝向精神科学的制度化而遗失了。在这一方向上的首要贡献乃是问题的转变：“做什么”变成了当今时代更为急迫的问题“让什么”。

弗朗柯·沃尔皮 (1952-2009)，意大利哲学家
王宏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